

经济增长包容性要素:天地人和

——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 GMM 分析

方大春^{1,2}, 张凡¹

(1. 安徽工业大学 商学院, 安徽 马鞍山 243032; 2. 复旦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从经济学发展历程和经济增长理论角度, 阐述包容性增长需要依赖自然资源, 需要适当地区差异存在, 需要让居民分享成果, 需要和谐稳定环境保障。在此传统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 构建包容性增长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结果表明: 自然资源增加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城乡差距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存在着“倒 U”型关系; 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促进经济增长, 并且贡献最大; 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对经济增长作用也存在着“倒 U”型关系。传统经济增长两大要素——就业人数和物质资本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 经济增长存在很大惯性, 上一期经济总量对当前经济增长产生重要促进作用。

关键词:包容性增长; 天地人和; 系统 GMM

中图分类号: F04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505(2015)03-0093-11

Inclusive Factors of Economic Growth: Nature, Region, Livelihood and Harmony

—Based on Provincial Dynamic Panel Data GMM Analysis

FANG Da-chun^{1,2}, ZHANG Fan¹

(1. School of Business,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hui Maanshan 243002, China;

2. College of Management,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perspective, exploring economic inclusive growth need to rely on natural resources, to exist appropriate regional differences, to allow residents to share fruits and harmonious and stable security environment.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economic growth model, inclusive growth dynamic panel model is built.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natural resources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urban-rural gap exists “inverted U” shaped relationship on economic growth mechanism; two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economic growth, employment and physical capital, als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growth exists a great inertia. Early total econom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inclusive growth; nature, region, livelihood and harmony; systematic GMM

收稿日期: 2015-03-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包容性增长实现路径研究”(11CJL001)

作者简介: 方大春, 男, 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教授, 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研究; 张凡, 男, 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研究生, 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研究。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日益增多。在收入分配领域表现为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在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表现为资源配置严重不均,投资和消费领域表现为结构失衡,科技创新领域表现为创新能力低下、依赖性强;另外,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区域及城乡发展差距逐步扩大、行业及部门之间收入差距拉大、就业结构不合理等矛盾依然突出,社会领域存在的矛盾严重制约着经济持续、深入发展。在改革向深水区迈进、不断出现日益加大的社会问题背景之下,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理念应运而生。全面践行“包容性增长”理念,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和谐发展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的中心任务和重点工作。

包容性增长又称包容性发展或共享式增长,最早于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在《新亚洲、新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报告中提出,包容性增长是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状态的一种描述。它包含两个基本要素:一是经济以科学的方式增长;二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共享成果;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首先,包容性增长既注重经济发展的速度,更注重发展的方式,即不仅要有数量,更要有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做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之间的相互包容。其次,包容性增长重点强调所有人的幸福,既要有同质的发展权利,也要有平等的分享权利,做到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相互包容。要实现所有人的幸福必须强调两个方面:参与和共享。

学术界从多角度对包容性增长展开研究,研究成果比较丰富,集中在五个方面:(1)包容性增长学理。对“包容性增长”学源的理解可以从经济学发展历程,以及现代人们对传统经济增长观的认识与反思中寻找根源(李刚^[1],2012)。包容性增长蕴含中国式智慧(郑杭生^[2],2011;方大春^[3],2012)。需要从经济学再到政治经济学视角理解包容性增长(邵宜航、刘雅南^[4],2011)。(2)包容性增长的内涵。Ali & Son(2007)将包容性增长定义为一种在社会机会上的益贫式增长^[5]。Zhuang & Ali(2009)将包容性增长定义为一种能促进机会增加且机会平等获得的增长^[6]。包容性增长内涵非常丰富,可以概括为经济增长需要与“天地人和”四个方面(方大春^[7],2011)。(3)包容性增长价值。包容性增长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方大春^[8],2011;李中建^[9],2012),包容性增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范式(周佰成、朱斯索、秦江波^[10],2011),包容性增长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体现了公平与正义的科学内涵,是一种理想的经济增长方式(黄秋菊、景维民^[11],2011),包容性增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途径选择(何荣山、刘培森^[12],2011)。(4)包容性增长实现路径。包容性增长需要我国社会福利政策转型(刘爱萍^[13],2013),包容性增长实现需要顶层设计(胡庆亮^[14],2011)。包容性增长是对“中国模式”的“单边性增长”的辨症施治,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必须协调好消费(分配)与生产(投资),尤其是劳动与资本、民生与国计、公共服务与政府税收等基本关系(张玲、付强、周兴维^[15],2011)。实现包容性增长近期突破的重点应该是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充分发展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服务业和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政策(高传胜^[16],2012)。(5)包容性增长测度。一些学者(魏婕、任保平^[17],2011;于敏、王小林^[18],2012;徐俊武、曹晖^[19],2012)运用不同方法构建评价体系对经济增长的包容性进行考察和测度,经济增长的包容性不容乐观,要真正实现包容性增长任重而道远。

目前对包容性增长研究还处在理论研究层面,对实现路径选择没有实证分析支撑。只有极少文章,如马强文、任保平(2012)基于经济可持续的视角构建包容性增长影响因素模型,显得不够全面^[20]。另外,梳理中国经济增长影响要素实证分析文献,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一是从“三驾马车”角度考察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大小(吴诣民、刘世彦,2000;沈坤荣、孙文杰,2009;杨飞虎,2010),二是从投入产出角度考察要素投入贡献率大小(田娜,2012;张煜、孙慧,2015);这两个方面直接从投入产出角度考察经济增长效率,没有从间接角度考察经济增长内在要素和可持续发展要素;三是重点突

出某个影响因素,如制度因素(马健,邵赟,1999;丁辉侠,2012)、地理因素(梁涵、姜玲,2013;黄新飞,李元剑,张勇如,2014)、人口或者人力资本(李通屏、才亚丽,2010;张琼,白重恩,2011;王新军,赵静,2012)、收入分配(陈享光、李克歌,2014)。只有在考察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傅程远^[21],2013)、探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影响因素(杨玉华、罗斌^[22],2011;顾成军、龚新蜀^[23],2012)等问题研究中,把影响经济增长多种间接因素纳入实证模型中考察。

包容性增长要素探索更需要从实证分析角度验证,而且不能局限于个别要素,需要多角度考察经济增长间接要素。为此,下文内容安排如下:文章第二部分为包容性增长要素理论分析与待检验假设;第三部分为包容性增长模型构建;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过程与结果分析;第五部分为本文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包容性增长要素理论分析与待检验假设

自亚当·斯密《国富论》问世以来,经济增长及其理论就成为经济学的核心课题。经济增长理论不断发展和完善就是经济学家们不断寻找经济增长源泉的过程。重商主义学派认为金银财富积累对国民财富增长有重要贡献;重农学派认为农业生产是国民财富增长主要方式;古典经济学家主要关注土地、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后,经济增长理论中先后出现“资本决定论”“技术进步论”“人力资本论”“分工——专业化论”“结构效应论”和“制度决定论”。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历程来看,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增长理论的探索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可以概括为从单要素的经济增长模型到多要素增长模型,从注重要素投入到注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注重有形资本到注重无形资产,从外生经济增长理论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24]。从发展的历程来看,经济增长理论是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寻找新的突破,不断修正和改进并提出新理论。下面在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探讨包容性增长要素。

(一) 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从农作物播种面积视角考察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天”意味着自然界,包容性增长需要与“天”相协调,意味着经济增长要与自然界相协调,经济增长需要依靠自然环境,依赖自然资源。重农学派认为自然资本包括土地在内是创造一切财富的首要条件。配第是在核算国民收支差额时发现了劳动的价值,提出了“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重农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杜尔阁在其《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中更为直接阐述了土地永远是一切财富首要的、唯一的来源。弗朗斯瓦·魁奈也认为,所有的产业中农业是基础,而且只有土地的产品才是原始的、纯粹得到的、经常在更新的财富。约翰·穆勒认为经济增长将因土地资源稀缺和人口过快增长而趋于停滞,提出的“稳态经济理论”,是对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关于资源稀缺观点的综合。马尔萨斯认为自然资源的短缺将会导致经济增长一次又一次的停滞,即使技术进步也只能带来短暂经济的增长,经济最终会随着自然资源的枯竭而崩溃。新古典经济学派,将自然资本的供给视作一个既定的外生变量,而偏重于研究在此前提下的资源最优配置问题。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自然资本要素的关注日益减少甚至不予考虑,而更多地关注技术和制度等其他要素,把自然资本这一古典增长要素简化为单纯的“生产成本”问题。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正在大幅度地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例如稀缺价格会发出信号以节约和替换稀缺资源,或者会引发技术创新。伴随着对经济增长现代性的反思,人们逐渐又重新审视自然资本要素对现代经济增长内在意义,在经济理论中关注自然环境因素已渐成潮流^[25]。

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史表明,自然资源的确对于一国国民财富的初始积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快速工业化与其丰裕的自然资源密不可分。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

来越多资源丰裕的国家陷入了增长陷阱的事实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深思。经验数据显示,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范围来看,资源丰裕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是缓慢的,甚至是停滞的,出现“荷兰病”现象。徐康宁、邵军(2006)以1970—2000年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差异为研究对象,结论显示,自然资源的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性,“资源诅咒”的命题确实成立^[26]。

自然资源包括哪些,于光远定义为自然界天然存在、未经人类加工的资源,如土地、水、生物、能量和矿物等。对于人口众多国家来说,耕地不仅是农业生产活动空间载体,更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本文以农作物播种面积作为自然资源替代指标。在我国,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一半,不存在“资源诅咒”问题。因此,我们提出假设1:农作物播种面积增加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

(二) 地区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指标

区域经济学中对如何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有两种理论观点:平衡增长理论(均衡发展理论)与不平衡增长理论(非均衡发展理论)。区域平衡增长理论认为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各国或一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趋同,呈收敛之势;不平衡增长是短期的,平衡增长是长期的。所以,区域平衡增长理论主张要在区域内均衡布局资源要素,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代表学者有纳尔逊、纳克斯。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假设下,也提出了区域收入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最终可以趋同的假说。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是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地区差距不是缩小而是继续扩大问题。相反,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不可能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首先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地区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就会通过“循环累积因果”过程,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回流效应也叫极化效应,表现为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扩散效应也称为涓滴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资本逐利性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区域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早期,代表学者有缪尔达尔,艾尔伯特·赫希曼。随后,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理论,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即区位优势优越的地区。

罗斯托也在《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提出经济起飞条件之一:生产性投资率提高,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提高到10%以上;经济中出现一个或几个具有很高成长率的领先部门。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地区经济差异是资源集中,产生规模经济、达到门槛规模的需要^[27]。一个地区城乡收入之间开始差距扩大,有利于资源向城市集中,产生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待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如果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导致城乡不能形成协调发展,阻碍经济增长。由此,我们提出假设2: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作用存在“倒U”促进机制,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阶段,地区差距扩大有利于经济增长,待到经济发展水平达到相对较高阶段,地区差距扩大阻碍经济增长,即城乡收入差距一次项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其二次项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

(三) 居民分享改革成果与经济增长:以居民收入水平入手

西方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西方古典经济学物本主义经济学的最终形成,并从此奠定了斯密以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物本主义基础,西方经济学把财富作为最为重要的研究目标。尽管马克思、西斯蒙第(Sismondi)、霍布森(Hobson)、巴师夏(Bastiat)等在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中努力纠正经济学研究中“见物不见人”的错误倾向,但他们的人本主义呐喊被湮没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喧嚣声中。长期以来,在物本主义思想原则指导下的经济增长理论,突出强调物质财富的增长,

将物质财富的增加看作是经济增长的终极目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带来急剧增加社会财富,也带来巨大的社会问题。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的爆发,表明物本主义经济增长已经开始走向末路。要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增长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经济增长思维必须从物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向人本主义的经济增长转变。传统的物本主义经济增长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终极目的,忽略了人作为经济增长主体地位和作用;人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在强调社会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强调社会和谐问题,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问题。因此,人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更强调的是符合人类根本利益的社会财富的可持续增长^[28]。其实,亚当·斯密早在《道德情操论》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合人情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当前,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彻底告别了经济短缺的局面。斯密的这段话给当前的我们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经济发展成果分享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和社会稳定。

居民收入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提升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二是提高居民收入,促进消费。舒尔茨(Schultz T. W., 1960)明确提出人力资本是当今时代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以罗默(Romer, 1986)和卢卡斯(Lucas, 1988)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认为物质资本积累并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提升人力资本主要通过教育、培训和健康保健等,这些投入主要来源于居民收入,其次是政府的公共教育支出。提高居民收入,有利于提高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经济增长。根据凯恩斯消费理论,若不考虑其他的影响因素,消费函数可以表示为: $C = a + bY$,其中, a 为自主性消费, b 为边际消费倾向, Y 表示居民收入, C 代表消费。从收入的结构构成角度看,对居民而言,不同的收入部分具有不同的消费倾向,假设收入由工资性收入(Y_w)和非工资性(利润性)收入(Y_p)两部分构成,各自的 b 分别为 b_w 和 b_p ,则 $C = a + b_w Y_w + b_p Y_p$ 。一般而言,利润性收入消费倾向小于工资性收入,即 $b_w > b_p$,则工资性收入和利润性收入的不同增长所带来的消费效应是不同的。假设初次分配调整使劳动者报酬率(Ω)上升,在一定收入流的条件下,则有一部分收入(X)从利润性收入转变为工资性收入,于是 $C = a + b_w \cdot (Y_w + X) + b_p (Y_p - X)$,调整前后的消费支出相差为 $X(b_w - b_p)$ 。因此,初次分配领域 Ω 的提升将带来消费的增长。在初次分配领域提升 Ω 有利于扩大消费,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呢?这需要观察 Ω 的提升对投资(I)和净出口(NX)的影响。在一定收入流的条件下, Ω 的上升意味着利润性收入的减少,这会影响到企业对未来利润的预期,从而导致投资的减少,即 $\frac{\partial I}{\partial \Omega} < 0$ 。而对净出口而言,净出口取决于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产品国际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单位劳动成本的下降,劳动者报酬率的上升可能带来单位劳动成本的增加,从而可能会对净出口产生消极影响 $\frac{\partial NX}{\partial \Omega} < 0$ 。 Ω 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趋于正向还是负向是由其对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者的效应总和决定的。提高居民收入可能在短时间内影响投资,但在长时间会提高企业对未来利润的预期,诱发企业扩大投资。目前我国出口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附加值比较低,导致劳动者报酬率的上升带来单位劳动成本提高,减少出口企业利润,从长远来看,居民收入水平提升,提高工人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出口产品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产品转型^[29]。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不仅扩大消费,而且倒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由此,我们提出假设3:居民收入提高,有利于扩大消费,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

(四) 和谐社会建设与经济增长:以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为指标

从经济增长探索历程来看,研究方法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占主导地位的衰落到新古典主义的复兴,经济增长的源泉从资本决定论到技术创新论再到制度决定论的转变,使众多经济学家认识到,实现经济增长不能单纯讨论经济因素的作用,经济学还不能独立于政治、文化和历史之外全面解释经济增

长。以道格拉斯·诺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突破了古典经济理论制度既定的传统假设,强调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有效率的制度能够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经济学家们充分考虑了制度对个体经济行为的约束和激励,从制度及其变迁的角度解释经济增长的同时,运用包括观念、道德规范、意识形态在内的非正式制度完善其理论,使经济增长理论不断得到充实。20世纪80年代,社会资本学者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不能仅仅用土地和自然资源、物质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本来解释,信任、价值观等社会资本也会影响经济增长^[30]。罗斯托(Rostow W. W., 1960)在《经济成长的阶段》提出,适宜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风俗环境是经济起飞的四大重要条件之一。一个和谐稳定社会环境,不仅能够减少交易成本,而且是经济生产活动的保障。

社会和谐稳定财政投入包括直接投入和间接投入,从广义上来看,整体财政投入都是为了创造一个社会和谐稳定。在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直接是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最基本保障。而且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也不能太高,否则一部人不想参加工作,依靠社保生活,西方一些国家高社会保障福利水平导致失业人口较多,影响经济增长。我们提出假设4:社会保障(含就业)财政支出有利于保障社会稳定,对经济增长作用可能存在“倒U”促进机制。

三、计量模型、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一) 计量模型与变量选择

本文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型上纳入包容性增长“天地人和”要素,构建包容性增长模型,为了消除数据异方差,需要对各变量取对数。

$$\begin{aligned} \ln gdp_{it} = & c + \alpha_1 \ln crop_{it} + \alpha_2 \ln gap_{it} + \alpha_3 (\ln gap_{it})^2 + \alpha_4 \ln pr_{it} \\ & + \alpha_5 \ln psec_{it} + \alpha_6 (\ln psec_{it})^2 + \beta X_{it} + \xi_{it}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quad (1)$$

其中, gdp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地区生产总值。 $crop$ 为农作物播种面积。相比其他自然资源,农作物播种面积相对更为重要,故选择农作物播种面积作为自然资源替代变量。 gap 为城乡差距,城乡差距=各地区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各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 pr 为居民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纯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化率+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城市化率)。 $psec$ 表示人均社会保障与就业财政支出。

以2000年为基期,采用GDP平减指数把各地区不同年份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人均社会保障与就业财政支出换算成不变价格。

X 表示其他一些控制变量,由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很多,本文把传统经济增长两大要素,就业人数和物质资本存量纳入进来,考虑到城镇化影响就业人数和物质资本空间分布,产生集聚效应,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需要纳入控制变量中。

$unem$ 表示失业率,本文选择失业率作为控制变量有两点考虑:一是失业率是就业率逆指标,间接反映就业人数;二是失业率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指标。

$mate$ 表示物质资本存量。物质资本存量的计算必须采用永续存盘法,在此,采用单豪杰(2008)的方法对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固定资产进行核算^[31]。根据公式 $K_t = K_{t-1} \times (1 - \delta) + I_t$, K_t 表示物质资本存量, K_{t-1} 表示上一期的物质资本存量, δ 表示折旧率, I_t 实际表示固定资本形成额。实际固定资本形成额是对固定资本形成额(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进行平减得来的。最后算出来的物质资本存量必须用GDP平减指数进行平减,换算成以2000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

urban 表示城市化率。用以非农人口占总人口之比来衡量各地区的城市化率,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ζ_i 表示个体效应,反映了省际间持续存在的差异; ε_{it} 表示随机误差项; i 代表时间; t 代表地区。为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城乡差距和人本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加入城乡差距和人本财政投入的二次项。为了消除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我们对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

(二) 数据说明

本文采取的是各地区面板数据集,以中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为样本(因西藏地区统计数据不全,没有纳入),时间区间从2001—2012年。下表1给出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表1 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lngdp	亿元	8.5048	0.9948	5.6602	10.6559
解释变量	lncrop	千公顷	8.1915	1.0367	5.6444	9.5654
	lngap	%	1.0868	0.1896	0.6671	1.5599
	lnpr	元	8.7477	0.5021	7.7718	10.2926
	lnpsec	元	5.5452	0.8575	3.5708	7.6717
控制变量	lnunem	%	1.29088	0.2233	0.1823	1.8718
	lnmate	亿元	8.1491	1.2111	4.9926	10.6978
	lnurb	%	3.8165	0.2984	3.1764	4.4920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估计方法

在没有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对上述方程(1)进行最小二乘法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将是有的,也是非一致的。内生性主要体现在联立性、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①联立性。联立性的本质就是解释变量有可能由因变量决定,或者解释变量和因变量同时受其它变量的影响,这种情况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在现实中最为常见。本模型具体表现在:威廉姆逊(J G Williamson, 1965)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随着GDP增长,出现先扩大和后缩小“倒U”型理论,本模型中城乡差距大小受到GDP发展阶段影响;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与GDP之间也存在相互支撑。②遗漏变量。任何一个模型都无法将解释变量全部纳入模型中去,在这样的情况下,遗漏变量的影响就被纳入了误差项中。在该遗漏变量与其他解释变量相关的情况下,就引起了内生性问题。③测量误差。统计口径和数据质量的差异难以避免,不少变量难以准确测度甚至难以量化,不得不采用代理变量。因此,不论是真实变量本身,还是真实变量与代理变量之间,通常都会存在测度误差,并进入回归方程的误差项,造成内生性问题^[32]。因而,传统估计方法进行估计时必将产生参数估计的有偏性和非一致性。

实际上,任何经济因素变化本身均具有一定的惯性,前一期结果会对后一期产生一定影响(杜立民^[33], 2010)。因此,本文把上期地区GDP纳入模型中,模型构建会产生联立性问题;另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我们不可能一一列出来,模型构建也会有遗漏变量。本文采用Arellano和Bond(1991)^[34], Blundell和Bond(1998)^[35]提出的动态面板数据的GMM估计能很好的解决以上问题。取差分后能够消除掉这些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和个体非观测效应,从而能够部分地解决遗漏变量问题。为了检验工具变量是否有效,需要进行sargan检验,其原假设是模型的过度识别约束是有效的。另外

还需要对随机误差项的一阶和二阶序列自相关进行检验,其原假设为随机误差项不存在序列自相关。

因此,本文采用动态面板对模型进行估计,具体模型为:

$$\begin{aligned} \ln gdp_{it} = & c + \alpha_0 \ln gdp_{it-1} + \alpha_1 \ln crop_{it} + \alpha_2 \ln gap_{it} + \alpha_3 (\ln gap_{it})^2 \\ & + \alpha_4 \ln pr_{it} + \alpha_5 \ln psec_{it} + \alpha_6 (\ln psec_{it})^2 + \beta X_{it} + \xi_{it}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quad (2)$$

为了消除个体效应 ξ_i 的影响以及选择合适的工具变量,对模型(2)进行一阶差分得到:

$$\begin{aligned} \Delta \ln gdp_{it} = & \alpha_1 \Delta \ln gdp_{it-1} + \alpha_2 \Delta \ln crop_{it} + \alpha_3 \Delta \ln gap_{it} + \alpha_4 \Delta (\ln gap_{it})^2 + \alpha_5 \Delta \ln fina_{it} \\ & + \alpha_6 \Delta (\ln fina_{it})^2 + \alpha_7 \Delta \ln mort_{it} + \alpha_8 \Delta \ln unem + \beta \Delta X_{it} + \Delta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quad (3)$$

首先对模型进行差分 GMM 和系统 GMM 估计,并将两种方法进行对比。看看哪种估计方法更适合我们这个模型,下表为差分 GMM 和系统 GMM 的估计结果。GMM 估计可采用一步法或两步法,相比一步法估计,两步法不容易受到异方差的干扰,对系统 GMM 更加稳健有效,对于模型系统 GMM 选择两步系统 GMM 估计方法。一般情况下,系统 GMM 要优于差分 GMM,系统 GMM 估计的好处有:第一,对于存在非时变的遗漏变量问题,该估计方法产生结果不会出现有偏性。第二,在估计模型的右边存在内生变量时,工具变量的使用会使得系数的估计是一致的。第三,即使存在测量误差,工具变量的使用也会得到一致性的估计(Bond et al., 2001)。

(二) 实证分析

基于此,选择系统 GMM 两步法对模型中控制变量逐步纳入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2。

表2 系统 GMM 的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lngdp(-1)	0.9078*** (94.46)	0.7041*** (18.40)	0.8670*** (61.72)	0.7517*** (30.24)	0.7437*** (24.17)
ln crop	0.0199*** (2.57)	0.0925*** (6.18)	0.0821*** (5.15)	0.0888*** (4.22)	0.1028*** (5.67)
ln gap	1.4005*** (6.11)	1.1771*** (7.09)	1.0707*** (2.89)	1.2479*** (3.56)	1.0095*** (3.36)
ln gap ²	-0.5965*** (-5.82)	-0.4759*** (-5.97)	-0.4278** (-2.52)	-0.5074*** (-3.29)	-0.3910*** (-2.90)
ln pr	0.2344*** (15.27)	0.2405*** (7.89)	0.1640*** (8.48)	0.2151*** (7.84)	0.1887*** (6.21)
ln psec	0.1428*** (4.79)	0.1606*** (4.31)	0.1119*** (3.88)	0.1020*** (3.05)	0.1135*** (2.96)
ln psec ²	-0.0163*** (-6.15)	-0.0176*** (-5.32)	-0.0124*** (-4.83)	-0.0122*** (-3.95)	-0.0130*** (-3.71)
ln unem		-0.0257 (-0.78)	-0.0671*** (-4.11)		-0.0629** (-2.11)
ln mate		0.1143*** (7.29)		0.0838*** (8.06)	0.0878*** (5.70)
ln urb			0.2593*** (7.63)	0.0866 (0.93)	0.1292 (1.39)
常数项	-2.3965*** (-14.19)	-2.1986*** (-9.79)	-2.6492*** (-8.72)	-2.3415*** (-5.63)	-2.1931*** (-5.79)
工具变量个数	72	74	74	74	75

(续表)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Wald $-\chi^2$ 统计量	412356.57 (0.00)	175329.67 (0.00)	147932.50 (0.00)	138674.61 (0.00)	119719.55 (0.00)
Sargan 值 (P 值)	27.5013 (1)	27.4817 (1)	27.3956 (1)	27.6661 (1)	27.3534 (1)
AR(1)	0.0251	0.0213	0.0203	0.0277	0.0183
AR(2)	0.1194	0.1483	0.0971	0.1203	0.1132

注:估计系数下方括号里的数字为系数估计值的 z 统计量,其中***、**、*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AR(1)和 AR(2)检验的原假设 H_0 为: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系统 GMM 估计的一致性,要求差分方程不存在二阶或者更高阶的自相关,但允许存在一阶自相关,原假设下统计量服从标准正态分布;Sargan 检验的原假设 H_0 为:工具变量过度识别,若原假设被接受,则表明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合理的,原假设下统计量服从卡方分布。

从表2中可以看出,模型2到模型4是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系统 GMM 估计结果,5个模型的随机扰动项的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 AR(1)的 p 值都是小于0.05的,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 AR(2)的 p 值都是大于0.05的,统计值均不显著,说明这些模型没有发现水平方程误差项存在序列相关问题,而判断工具变量过度识别 sargan 检验的 p 值都大于0.05,说明模型所选择的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从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来看,差别并不很大,系数符号保持不变,说明模型具有一定稳健性。

在模型5中,农作物播种面积($\ln crop$)、城乡差距($\ln gap$)、城乡差距二次项($\ln gap^2$)、居民收入($\ln pr$)、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ln psec$)、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二次项($\ln psec^2$)这些解释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理论假设预期相一致。生产总值滞后一期,即 $\ln gdp(-1)$ 的系数为0.7437,这验证了经济增长确实存在着惯性,滞后一期的经济对当期的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生产总值滞后一期这一变量里面包含了经济增长模型中许多忽视的因素,这些因素都对经济增长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农作物播种面积($\ln crop$)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1028,说明随着各地区农作物播种面积增加,对经济增长有利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只是自然资源的一个缩影,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出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城乡差距($\ln gap$)变量的回归系数为1.0095,这是一个正值,表明城乡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增长有利,城乡差距取二次项($\ln gap^2$)系数却是一个负值(-0.3910),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倒U”曲线机制,拐点值为 $\ln gap = 1.2909$,近12年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平均值为 $\ln gap = 1.0979$,还没有达到拐点值,随着经济增长今后城乡收入差距有可能继续扩大。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ln psec$)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1135,说明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增加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但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的二次项的回归系数变成了负数,说明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两者的关系是一个“倒U”曲线,拐点值为 $\ln psec = 4.3653$,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省份社会保障与就业已经达到拐点,也就是要求政府对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从总量提升转变为结构调整,提高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针对性与有效性。失业率意味着就业人数较少,也加重了政府的负担,失业率增加阻碍经济增长。物质资本存量增加促进经济增长。从符号来看,城镇化水平提升促进经济增长,只是统计检验不显著,有可能说明: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不显著,需要从人口城镇化向经济城镇化转型。

五、结论与建议

包容性增长影响因素非常多,很难把影响要素纳入到经济增长包容性模型中。考虑到过多指标变量容易产生共线性,以及动态面板模型工具变量有效性,本文各选取一个最重要或者最基本指标作为“天地人和”四个方面替代指标。从天(自然资源)、地(城乡地区收入差异)、人(居民收入水平)、和(和谐稳定财政保障支出)角度,构建包容性增长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中国2001—2012年“天地

人和”要素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由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可以很好地解决变量之间的内生性和遗留变量问题,并逐步增加控制变量,模型具有稳健性,实证估计结果相对准确。实证结果为:自然资源增加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城乡差距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存在着“倒U”型关系,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促进经济增长,并且贡献最大,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对经济增长作用也存在着“倒U”型关系,与理论假设预期相一致。传统经济增长要素就业人数和物质资本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经济增长存在很大惯性,上一期经济总量对当前经济增长产生重要促进作用。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节约集约利用国土资源,走“四化同步”协调发展道路。国土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生存之本、发展之基、民生所依、国脉所系。我国土地资源总体情况可以概括为:总量多,人均土地少、高质量耕地少,可开发的后备土地资源不足等。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高效利用;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加强矿产资源勘查、保护、合理开发的要求。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土地资源的供需矛盾凸显,破解保护难和保障难的“两难”局面将成为我们的一项长期任务。国土部最近统计表明,我国城镇低效用地占到40%以上,农村空闲住宅达到10%—15%,农村空心化问题严重。当前,我国资源粗放利用的现状还没有根本转变,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土地单位面积产出率低等问题尤为明显,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地耗、能耗不仅高于发达国家且高于一些新兴国家,深入推进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是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的必由之路。坚持在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四化同步”中置换农村闲置土地,提高城镇土地利用效益,支撑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

2. 加大对三农投入力度,统筹城乡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倒U”型关系。我国目前正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上升部分,还没到达曲线的拐点。在这一时期,随着经济增长,城乡差距还会继续扩大,但要防止这种差距人为的扩大。城乡差距扩大,一部分是由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还有一部分是由于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造成的。我们要完善我国的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减少城乡差距非自然因素,要把这种差距限定在可控的范围内。按照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的要求,不断增加“三农”投入;多途径促进农民就业创业,提高农村居民非农收入;落实强农惠农政策,推进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3. 提升居民收入,增加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提高居民收入不仅直接扩大居民消费,而且有利于提高国民人力资本水平。一是着力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众的基本收入。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速度不低于GDP增速。二是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合理调整税率结构,切实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三是创造一个更加完备的市场条件,大力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

4. 调整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结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经过多年改革和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框架,但这种保障体系框架不够完善,如地区差异较大、层次较低、部分领域空白等问题。这需要我们区别轻重缓急,逐步完善,并注意逐步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各类群体之间的待遇差距。把保障作为民生之基,健全覆盖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 [1]李刚.包容性增长的学源基础、理论框架及其政策指向[J].学术月刊,2011(8):86-92.
- [2]郑杭生.让“包容”牵手“和谐”——包容性增长里的中国智慧[N].光明日报,2011-03-03(02).
- [3]方大春.包容性增长:中国式智慧的经济增长[J].当代经济管理,2013(2):5-10.
- [4]邵宜航,刘雅南.从经济学再到政治经济学:理解包容性增长[J].经济学家,2011(10):5-13.

- [5] ALI I, H H SON. Measuring Inclusive Growth[J].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2007, 24(1): 11-31.
- [6] ALI I, ZHUANG J. Inclusive Growth Toward a Prosperous Asia[R]. ERD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97, 2007.
- [7] 方大春. 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天地人和[J]. 红旗文稿, 2011(10): 20-22.
- [8] 方大春. 包容性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J]. 宏观经济管理, 2011(7): 46-47.
- [9] 李中建. 包容性增长理念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化解[J]. 当代经济研究, 2012(4): 65-69.
- [10] 周佰成, 朱斯索, 秦江波. 包容性增长:社会经济新发展的新范式[J]. 当代经济研究, 2011(4): 85-88.
- [11] 黄秋菊, 景维民. 经济转型与包容性增长的关联度[J]. 改革, 2011(9): 28-32.
- [12] 何荣山, 刘培森. 包容性增长:构建和谐社会的途径选择[J]. 学术交流, 2011(8): 89-92.
- [13] 刘爱萍. 包容性增长与我国社会福利政策转型研究[J]. 理论探讨, 2013(1): 98-101.
- [14] 胡庆亮. 制度构建与公平正义:顶层设计、包容性增长、和谐社会的关联与实现[J]. 求实, 2011(9): 51-53.
- [15] 张玲, 付强, 周兴维. 走向“中国道路”的“包容性增长”[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7): 131-136.
- [16] 高传胜. 论包容性发展的理论内核[J]. 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1): 32-39.
- [17] 魏婕, 任保平. 中国经济增长包容性的测度:1978—2009[J]. 中国工业经济, 2011(12): 5-14.
- [18] 于敏, 王小林. 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测量与评价[J]. 经济评论, 2012(3): 30-38.
- [19] 徐俊武, 曹晖. 中国包容性增长实现程度的估算:1978—2008[J]. 学习与实践, 2012(12): 18-23.
- [20] 马强文, 任保平. 包容性增长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经济可持续的视角[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7): 101-108.
- [21] 傅程远. 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分析——基于1996—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3(10): 51-56.
- [22] 杨玉华, 罗斌.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动力源泉及其因素分解——基于中国1952—2009年的实证分析[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11(4): 39-46.
- [23] 顾成军, 龚新蜀.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科技论坛, 2012(3): 111-117.
- [24] 左大培, 杨春学. 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内生化历程[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7: 4-20.
- [25] 毕秀水. 经济增长理论的自然资本观述要[J]. 长白学刊, 2006(2): 55-57.
- [26] 徐康宁, 邵军. 自然禀赋与经济增长:对“资源诅咒”命题的再检验[J]. 世界经济, 2006(11): 38-47.
- [27] 杨竹萃. 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的发展与演变评析[J]. 工业技术经济, 2009(8): 63-68.
- [28] 钟怀宇. 经济增长从物本主义向人本主义的转变[J]. 经济问题, 2007(1): 4-6.
- [29] 刘东皇, 孟范昆. 初次分配、再分配与发展方式转变[J]. 湖北社会科学, 2012(5): 57-60.
- [30] 郭少新, 何炼成. 社会资本:解释经济增长的一种新思路[J]. 财贸研究, 2004(2): 7-10.
- [31] 单豪杰. 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算:1952—2006年[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10): 17-31.
- [32] 李锴, 齐绍洲. 贸易开放、经济增长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J]. 经济研究, 2011(11): 60-72.
- [33] 杜立民.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J]. 南方经济, 2010(11): 20-33.
- [34] ARELLANO BOND. 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Data: 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s[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1, 58(2): 277-297.
- [35] R BLUNDELL, S BOND. 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8, 87(3): 115-143.